

“浙江现象”与人口素质

叶明德, 孙胜梅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三普”、“四普”、“五普”资料显示, 浙江省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 在全国各省、市、区中处于中下水平。然而, 改革开放20多年来, 浙江省经济发展迅速, 1978~2000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由全国第12位跃至第4位。本文对受教育程度处于全国中下水平的浙江人口群体创造了全国一流经济业绩的现象进行了解释, 并且认为, 提高人口素质尤其是科学文化素质是浙江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战略性问题。

关键词: 浙江省; 人口素质; 创业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4)02-0032-07

“Zhejiang Phenomenon” and Population Quality

YE Ming de, SUN Sheng mei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310028)

Abstract: Data from the third, fourth and fifth population census show that educ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below the average level across the whole country. However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economy in Zhejiang province has developed rapidly. The GDP rank jumped from 12th in the year 1978 to 4th in the year 2000. The paper explains why such a population with relatively low education level has made the first class economy accomplishment.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improvement of population qual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especially of education, is big strategy for establishing a well off society.

Keywords: Zhejiang province, population quality; self-business

一、浙江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 浙江省的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处于全国前列, 可是浙江人口受教育程度并

不高。从“三普”到“五普”的数据资料均显示, 浙江省人口中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甚至比西部经济欠发达的一些省份还要低(见表1)。

收稿日期: 2003-09-30

作者简介: 叶明德(1943-), 男, 浙江省龙泉市人,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从事人口社会学方面的研究。

表1 浙江每10万人中拥有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数及居全国位次

文化程度	1982年		1990年		2000年	
	人数	在全国位次	人数	在全国位次	人数	在全国位次
大专以上	468	19	1171	18	3196	18
高中(含中专)	5200	24	7021	23	10785	18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第三、四、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后,国家统计局主持编写《跨世纪的中国人口》(综合卷)时,为了对各省人口文化程度进行综合评价,于是对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按各自的受教育年限加权(假定大学文化程度为20,高中程度为15,初中程度为10,小学程度为5,文盲为0),计算出人口文化程度综合指数。结果浙江省的人口文化程度综合指数为6.21,在全国各省、市、区中排第18位^[1]。

冯立天、戴星翼主编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再研究》以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来综合反映人口的受教育状况(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根据生命表的方法求得)。依据这种方法计算,浙江省1990年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为7.098,在全国各省、市、区中居第25位^[2]。

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之后,有的学者根据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了各省、市、区6岁及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并进行排序,浙江省为6.41年,居第19位^[3]。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后,为准确起见,我们根据长表中全国各个学级的学业完成状况,估算出各种文化程度人口实际受教育的年数(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中全国各种文化程度人口的学业完成情况估算,研究生为19年、大学本科15.5年、大学专科13.9年、高中与中专11.7年、初中8.7年、小学4.8年)。然后以此为标尺计算出各省、市、自治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并进行排序。结果表明,2000年浙江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80年,居第22位(见表2)。

表2 2000年按不同学业完成情况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地区	受教育年限	位次	地区	受教育年限	位次
全国	6.961		海南	7.021	16
北京	9.428	1	新疆	7.003	17
上海	8.745	2	山东	6.958	18
天津	8.370	3	江西	6.858	19
辽宁	7.766	4	广西	6.845	20
黑龙江	7.608	5	福建	6.819	21
吉林	7.581	6	浙江	6.803	22
广东	7.422	7	重庆	6.545	23
山西	7.381	8	宁夏	6.413	24
江苏	7.220	9	四川	6.347	25
内蒙古	7.138	10	安徽	6.332	26
湖南	7.109	11	甘肃	5.899	27
河北	7.108	12	云南	5.612	28
湖北	7.107	13	青海	5.544	29
河南	7.083	14	贵州	5.436	30
陕西	7.060	15	西藏	2.959	31

资料来源: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浙江省人口受教育程度低有历史的原因，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基础相当薄弱，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少、规模小，未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上世纪90年代在“科教兴省”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浙江省教育事业有了重要的实质性的进展。首先是狠抓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到1997年就通过了国家的“两基”验收。同时加大投入，推进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浙江省粗文盲率由1990年的17.61%下降到2000年的7.01%，在全国的位次由1990年的第22位上升至2000年的第17位；文盲率由1990年的22.95%降至2000年的8.55%，在全国的位次由1990年的第18

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15位。考察人口受教育程度，粗文盲率和文盲率是负值，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比重是正值。我们以大学文盲比^①这一指标来考察浙江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变化状况，发现浙江人口的大学文盲比已由1990年的6.65%上升到2000年的45.61%，增长了近6倍，在全国的位次也由1990年的第19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17位。然而，同各兄弟省、市、区相比，处于中下水平的格局基本上没有改变。

浙江省专业技术人员占在业人口的比重在全国也处于中下水平（见表3）。

表3 2000年各省、市、区专业技术人员占在业人口比重及位次

地区	专业技术 人员比重 (%)	位次	地区	专业技术 人员比重 (%)	位次	地区	专业技术 人员比重 (%)	位次
全国	5.70		浙江	5.83	17	重庆	4.54	26
北京	17.29	1	安徽	4.27	29	四川	4.28	28
天津	12.05	3	福建	6.33	13	贵州	3.76	31
河北	4.81	22	江西	5.53	19	云南	4.23	30
山西	7.44	8	山东	5.18	20	西藏	5.12	21
内蒙古	7.00	9	河南	4.32	27	陕西	6.18	15
辽宁	8.07	5	湖北	6.41	12	甘肃	4.80	23
吉林	7.78	7	湖南	4.71	25	青海	6.70	10
黑龙江	7.86	6	广东	5.86	16	宁夏	6.61	11
上海	12.81	2	广西	4.73	24	新疆	8.16	4
江苏	5.81	18	海南	6.28	1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册）第1097-1100页数据计算。

浙江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步早、发展快，中小企业发达，经济增长迅速，充满生机与活力。然而，浙江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至今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一个明显的、根本性的劣势，是影响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后劲的一个“瓶颈”。

二、解读“浙江现象”的人口素质支撑

浙江省本是一个无资源优势、无国家扶持、无政策优惠的“三无”小省，可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奇迹般地一跃而成为“经济大

省”，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浙江现象”。如上所述，浙江省的人口文化素质并不高，一直处于全国中下水平，难道在资源禀赋并不丰裕的浙江大地上创造一流的经济业绩不需要一流的人口素质支撑吗？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众多学者试图破解的“浙江之谜”。

“浙江现象”可从多个角度解读。制度创新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区位优势也引人注目，地域文化传统经常被提及。然而，人世间一切奇迹都是靠人来创造的，人的素质对创业

^① 大学文盲比的计算公式是：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除以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乘100%。

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无可怀疑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待人的素质以及人的素质与创业的相互关系。

笔者认为，在分析浙江经济业绩与人口素质的关系时，为了避免简单化和草率下结论，以下几个问题必须予以应有的重视：

首先，对人口素质应作全面理解。

人口素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都较难把握。人口学界关于人口素质的两要素、三要素、四要素甚至更多要素之争由来已久，至今尚未止歇。有些学者主张人口素质主要包括健康素质和文化教育素质两方面，认为“人口的伦理道德素质是客观存在的，而实际上这已经进入了伦理学、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人口学也在事实上放弃了对它的深入研究”^[4]。笔者认为，人口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从根本上说，人口素质可分为自然素质和社会素质两大类。然而人口素质应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既有系统性，又有层次性，甚至还具有时代性，因而它的外延边界是模糊的，开放的。人口的社会素质比自然素质更为复杂，它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学校正规教育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有着独特的作用，但人的社会化途径并不限于学校正规教育。

其次，应充分重视创业者精神素质的作用。

不同的社会角色或同一社会角色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有不同的素质要求。作为人口群体中的一部分，创业者尤其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的创业者，既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的素质，如较好的身体素质、起码的知识素质和技能素质等，而且还需要具备某些特定的精神素质，如不墨守陈规、勇于开拓创新等。

1999年完成的“全球创业监测”项目首期研究报告指出：“大学教育与创业活动关系较弱，没有大学学位的人创立了3/4的企业”，“广义的文化在创业活动上起着关键的作用”^[5]。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人创业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这里所说的广义文化，既包括知识、技能等智力素质，也包括人的意识、观念、思维方式、志向、毅力、事业心、

吃苦精神、协作精神、诚实守信等非智力素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经济体制的转换期，创业成功与否，并不仅仅取决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而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业者有无开拓创新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浙江的创业者包括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多数是没有受过良好正规教育的普普通通的工人和农民。《福布斯》2001年度中国内地100位首富排行榜中，浙江籍企业家占了15位。他们是鲁冠球（万向集团）、吴良定（浙江中宝实业集团）、黄巧灵（宋城集团）、周庆治（南都集团）、李书福（浙江吉利集团）、楼忠福（广厦集团）、徐万茂（宁波华茂集团）、陈金义（浙江金义集团）、南存辉（正泰集团）、陈士良（浙江桐昆集团）、李勤夫（莱织华集团）、胡成中（德力西集团）、沈爱琴（万事利集团）、陆汉振（浙江金轮集团）、王建沂（杭州富通集团）。笔者在网上查询后发现，在这15位上了首富排行榜的企业家中，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竟有10位，占2/3。其中有1位是小学学历，有6位未完成初中或高中学业，辍学后曾当过铁匠、裁缝、修鞋工、木匠、泥瓦匠等，有的也干过农活。2002年杭州市政府曾出资900万元重奖三位企业家，他们是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娃哈哈集团总经理宗庆后、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这三位曾为杭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享誉国内外的创业者，他们创业前所接受的正规教育都只有初中及以下程度，其中冯根生为小学毕业，自称“小学本科”。最令人称奇的是湖州市的农民企业家潘阿祥，他一手创办了年销售量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振兴阿祥集团，下辖12个工业企业和两家科研机构，可他本人却是个文盲。在他的电话号码本里，布满了只有他本人才能辨认的“象形文字”。可是他能够通过听广播看电视及时捕捉商机，甚至还能适时地与人谈“大鼻子流涕”（WTO）^[6]。

在上世纪80年代，浙江人凭什么率先在浙江大地上掀起创业的浪潮？这只要看看浙江人是怎么创业就知道了。他们是抱着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不等不靠，白手起家。只要能赚钱，他们什么苦都肯吃，什么重活累

活都愿干。他们走南闯北，从事各种别人瞧不起的“下等活”：理发、补鞋、弹棉花、配钥匙……“既能做老板，又能睡地板”，是对浙江创业者的生动写照。他们机动灵活，讲求实效，赚十万元不嫌多，赚一分钱不嫌少，一种办法行不通就换一种思路，一个地方缺少发展空间就拉家带口寻找新的希望之地。正如人们所说：“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浙江人；哪里有浙江人，哪里就有红火的专业市场！”可见浙江人创业，凭的是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改变现实的愿望，凭的是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求发展、自强不息的自主精神，凭的是敢闯敢拼、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和埋头苦干、百折不挠的一股韧劲，凭的是机动灵活、不图虚名、讲求实效的务实精神，凭的是“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市场经济意识。一句话，浙江人创业首先凭借的是“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

浙江精神是在较为宽松的改革开放社会环境下培育出来的，但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浙江人多地少，资源匮乏。浙江人为了求生存求发展，早就有凭借自己技艺外出谋生的习惯。“义利并重”和“工商皆本”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孕育了浙江人的商业头脑和务实品质。“春江水暖鸭先知”，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中华大地时，浙江人便率先在商海中畅游起来，浙江精神由此而熠熠生辉。

第三，不能忽视“干中学”的作用。

人的素质提高过程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对一个创业者来说，他的知识、技能和基本素养的获得，学校教育固然是一个重要途径，但并非惟一途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技术和知识资本是人力资本的核心，而技术和知识资本的取得，主要通过专业学习（大学教育）、在职培训（on the job training）以及“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等途径^[7]。浙江省创业者文化素质较低，主要是他们接受学校正规教育不够充分，起点较低。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奋发进取，艰苦创业，这种创业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创造的过程。他们通过创业，无论在获取信息的能力、资源配置能力方面还是在生产活动中的技能技巧方面

都有很大提高。浙江人不仅走遍全国，而且把触角伸向世界各地。在国外务工经商的浙江人，不仅自己获得大量信息，学到了各种技能技巧，而且对其他浙江人起到了传播知识、信息和技能技巧的作用。

在创业过程中，尤其是在非生即死的市场搏击中，浙江人深感自身的不足，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学习深造的积极性。例如，温州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起初只是一个仅有初中学历的修鞋匠，可是当他把一家小打小闹的家庭作坊办成全国民营企业综合实力500强中的第5位大型企业集团时，他也由一个初中生变为一位博士生（他已获得首都经贸大学专科文凭和中国人民大学MBA硕士文凭，现正在南京的一所大学攻读经济管理博士学位）。曾经是南存辉同学的胡成中，读到初中一年级时就失学了。如今他已是拥有17亿元人民币资产的德力西集团董事长，在200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居第83位。作为企业的创始人，他不断充电，先后在上海交大、美国加州大学等著名大学求学。2000年11月他出版了《企业集团创新论》专著，探索民营企业的创新思路，总结出“新温州模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今他又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像南存辉、胡成中这样在创业中不断成长的创业者何止一两个，他们只不过是成千上万创业者中较为突出的代表而已。

第四，不能忽视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

人力资源的效用既取决于存量的大小，又取决于开发利用的程度。浙江的经济是“老百姓经济”。它的活力来自植根于浙江本土、由许多企业集聚而成的专业化产业群，又叫块状经济。通常一个块状经济集聚了成百上千小企业，分工极细，一个甚至多个小企业只生产一个零部件，从而大大降低了劳动者就业或创业的门槛，只要辛勤劳作，善于学习和模仿，就不难就业甚至不难成为小老板。在这种专业化产业区，创业者或就业者可以借助邻里效应，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产品或工种，体现了最佳的社会分工。专业化产业区内的众多小企业基本上都是由个人创办和经营的，为了避免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创业者或就业者都尽可

能将自己的智能和体能发挥到极限。因此，浙江人虽然受教育程度不高，但由于人力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因而在经济建设热潮中还是取得了特别显著的业绩。

从创业的动机或基础来看，创业可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浙江人的创业活动，多数属于白手起家的生存型创业。创业需要一定的人口素质支撑。然而如前边所述，人口素质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一两个单项指标很难确切地反映人口全面的综合性的素质。人口素质的高低也是相对的，只要人口素质基本上与当时当地的经济状况相适应，就能取得较好的经济业绩。从总体上看，浙江人口的身体素质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计算，浙江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 1990 年达到 72.03 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2.48 岁；2000 年达到 74.97 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3.57 岁），受教育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精神素质具有一定优势。这样的人口素质状况对于经济体制转型期以生存型创业为主导模式的创业活动来说是基本相适应的。浙江人的创业活动掀起之时，我国的经济尚属短缺经济，市场缺什么就可生产什么，生产什么就能卖什么，创业者的成败往往取决于能否冲破旧体制的束缚走向市场，能否自立自强、苦干实干。在这一阶段浙江人虽然受教育程度较低，但他们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于是取得了奇迹般的经济业绩。

三、“二次创业”呼唤人口素质的提升

上个世纪的后 20 年，对浙江人来说变化是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因为人们终于从整体上告别了贫困，告别了短缺。普通百姓的钱袋日益鼓起来，不再为一日三餐而发愁，开始讲求生活质量。进入 21 世纪后，浙江省经济领域依然是捷报频传。然而，如果以历史的眼光审视浙江创业者们所走过的足迹，就不难发现眼下所取得的业绩是初步的，基础性的，20 多年来的创业活动对于追求现代化的跋涉者来说，只不过是热身运动。

从后发展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历程来看，通常要经历这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模仿性追赶，即对于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生产技术、

经营经验和管理经验等采取“拿来主义”，依葫芦画瓢。韩国汉城国立大学金林素教授认为，“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公司通过反求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对现有外国成熟产品进行复制性模仿。大多数第二和第三层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此一阶段。^[8]”第二阶段是创造性追赶，即在模仿的基础上逐步使发达国家的技术、经验本土化，关注点由复制性模仿转向创造性模仿，逐步生产具有新型功能的仿制品和具有区域特色的新产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逐渐增强。第三阶段是创新与竞争，也就是说当追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到达前沿时，着眼点即从模仿转向原创，竞争对手也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浙江省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省份，过去 20 多年的创业活动基本上还是处于追赶西方先进技术的第一阶段。由于仿制成成熟的产品可以省去试错过程，因而入门快，成本低，加上浙江人模仿能力极强，所以在这一阶段浙江人如鱼得水，成绩辉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复制性模仿的局限性已逐渐暴露出来。

2003 年初，浙江省科技厅就如何建设科技强省、再造浙江经济新优势问题组织调研组赴各地作专题调研。在调研过程中，许多企业家反映：“企业越活越累，利润越来越低。”企业家们发问：“一流设备、二流产品、三流效益。我们的企业怎么了？”据国家统计局 2000 年统计，在全国 532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浙江产量居全国前 10 位的有 336 种，占 63%，但几乎没有一样是原创品^[9]。这表明浙江的制造业模仿力极强，创新力极弱。

种种迹象显露，浙江的企业和产业目前正面临升级换代的问题，也就是在追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进程中，应当由初始阶段的模仿性追赶转变为创造性追赶。这种转换的关键在于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对于广大创业者而言，则面临严峻的二次创业问题：或者实现从复制性模仿向创造性模仿的历史性跨越，甚至直奔先进技术前沿，抢占高新技术的制高点；或者被严酷的市场淘汰出局。

如前面所述，由于历史的原因，浙江省人口受教育程度相对偏低。在模仿性追赶阶段，

浙江人扬体制和机制优势之长,扬肯吃苦、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素质之长,有效地避免了受教育程度偏低之短。在这一阶段浙江省的创业者们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然而在创造性追赶阶段,人口的综合素质尤其是科学文化素质将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坎”。

企业研发能力的培养和扩展是由模仿性追赶阶段进入创造性追赶阶段的重要标志。在这一阶段,企业不仅要会依葫芦画瓢,而且要善于根据当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及市场需求来修改这只“瓢”。这一过程就是世界先进技术本土化过程和创新过程,需要一定的试错程序,因而在这一阶段企业需要有一大批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专业知识、能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科学技术人才。

此外,要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能力,还必须有高素质的职工队伍。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已明确提出,要把发展第二产业的重点放在培育和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上。如何培养“蓝领”阶层,提高他们的素质,将是关系到浙江制造业发展前景的关键性问题之一。

现代农业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农村剩余劳动力又是二、三产业职工的后备军。因此,农村劳动者的素质如何也直接关系到全省工业化、城市化及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总之,在新的起点上,先进技术的吸收、消化靠人,自主技术创新靠人,提高产品质量靠人,对企业实行现代化管理靠人,国际间资源优化配置还得靠人。要实现由模仿性追赶到创造性追赶的历史性跨越,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较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结构。如何快速地全面地提升人口素质尤其是科学文化素质,这是浙江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战略性问题。

参考文献:

- [1] 孙兢新等. 跨世纪的中国人口(综合卷).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4.
- [2] 冯立天等. 中国人口生活质量再研究.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 [3] 张西飞. 西部大开发的人口因素分析. 人口学刊, 2000, (4).
- [4] 邬沧萍等. 转变中的中国人口与发展总报告.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 [5] 宋克勤. 创业成功学.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2.
- [6] 乡下奇人和他的象形文字(据新华社). 青年时报, 2002-09-11.
- [7] 李建民. 人力资本通论.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9.
- [8] 金林素. 工业化进程中技术学习的动力.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2002, (2).
- [9] 张国云. 提高我省工业国际竞争力. 浙江日报, 2002-08-19.

[责任编辑 王树新]

(上接第13页)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1 [R].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 [2] 卢迈, 赵树凯, 白南生.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回顾与展望 [A]. 中国发展研究报告(2002版) [C].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2.
- [3] 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课题组. 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与劳动力流动 [J]. 管理世界, 2002, (3).
- [4]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1 [R].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 [5] 大卫·桑普斯福特, 泽弗里斯·桑纳托斯. 劳动经济学前沿 [M]. 中国税务出版社. 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 2000.
- [6] 何忠平. 民工潮叩问城市中国 [J]. 知识经济, 2003, (2).
- [7] 辜胜祖, 刘传江. 人口流动与农村城镇化战略管理 [M].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 王树新]